

公人说“公”

□ 胡森森

读林旭《值夜》诗句“身锁千门心里万，清辉为照倚阑干”，颇为其寒夜独坐、心忧天下的情怀感动。林旭被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充军机处章京，参预新政，在军机处夜间当值，考虑军国大事，不久变法失败，于菜市口英勇就义。由1898年的瀛海喋血回溯1894年的黄海哀鸿，再想起李鸿章1901年的临终绝笔“劳劳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”的无奈，虽有补苴罅漏之志士，终无聚民智力之能臣。古往今来不同政见、气质、出身、事功、评价的公人们，却在“为公”这个问题上同理同心，其间玄奥颇值得玩味。

对“公”的价值追求

追根溯源“公”字，说文解字说“平分也，从八从厶”。一说，是一个八字下面一个口，八是分配的意思，口代表声音气息，联系起来就是有权威的族长和领袖，在分配利益时一言九鼎、令人信服。可以看出，中国古人不太重视公与私的相对意义，而更重视公正、无私的价值意义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说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”，这是西周存在私田的证据，也是农业社会先公后私的观念痕迹。中国人是有理想、有梦想的民族，很早就怀有公的信仰，追求建立大道之行、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，建立公私分明的社会规则，进行公德公心的自我塑造。

对于“公”的基本认同，是从事一切公务活动的心理基础。公是一种领域，所以要公私分明，“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我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；公是一种价值，人是社会化动物，群体之内必有公理和规则，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，就是为了某种公理和规则，可以放弃和让渡利益，从而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，凝聚社会；公是一种信仰，是公务人员服膺和守护的第一原则，继而成为各种政治理念和主张的逻辑起点。个人不能不忠不孝、寡廉鲜耻，任何政治主张也都不能脱离公德、公理、公心而立论。公务人员的工作，本质上是一

种“公作”，为公家而劳作。如果不相信公共价值的存在，不忠于公共利益，只是为了私利而活着，对公务的坚持必不会长久，甚至很容易被诱惑失足，酿成个人的悲剧。

以“公”为底色的人际关系

公务的服务对象是人，公务人员生活的背景也是人。公务人员既生活在社会、公共、人民这样的抽象概念当中，更生活在具体可感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。对于人际交往的尺度和限制，要比一般人严格，对于人际交往容易采取中庸主义的态度。一方面必须对公民、人民这样的服务对象怀有感情，如果患上了吉登斯所说的现代社会“畏触感”，羞于同具体的人打交道，连在电梯里都不敢直视对面的眼神，肯定不适合从事公务。另一方面，对人际交往过于热衷，也会迷失在自我设计和关系网络中无法自拔，或唯唯诺诺，或处心积虑，或无所适从，或舍本逐末，身在公门而心萦私念，或被人情世故绑架，堕入泥淖苦不堪言。故于人际交往既要入得其中，又要出乎其外，不因公而苛刻，不因私而琐屑。人情往来有礼有节、有度有止，“清正俭素，门无私谒”，公恩不私谢，公烛之下不展家书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，是尊重别人，也是保护自己。

由此衍伸开来，古往今来同朝为官或同僚为曹者，都是纯粹而简单的关系，不应奢求过多，更不应依附攀缘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遇与不遇皆随缘。上下左右相互尊敬，按照规则做事，遇到情况提前沟通，尽量避免一些误解导致的矛盾，有的时候需要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有的时候又需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。宁折不弯是一种理想导向，是最后的选择，现实中更多的是不弯亦不屈。当然，不能无原则当好好先生，更不能亲疏有别厚此薄彼。清代就严禁监察官员与其他官员之间的不正当结交，规定科道官不得与三品以上大员来往。

从政治境界上讲，公务人员不应像捕获的鱼一样堆在一起苟延残喘，不应像鸱鸒那样防止别人夺取



公烛之下不展家书

自己那点残羹腐肉，而要跃入河海，相忘于江湖，心存高远飞向广阔天空。从事公务不是为讨上司欢喜继而平步青云，而是问心无愧奉献人生、贡献社会，在其中觉悟人生存在的价值。尊重不在畏惧、盲从、欲求，而在遵守政治共同体下分级管理的科层规则，寻求为公事顺畅运行的方便法门。所谓明君贤相的佳话，伯乐识马、千金买骨的传说，可以当作一种追怀，但切莫痴迷，“寄意寒星荃不察”的客观情况，往往才是身在公门的现实。官箴说，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休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”，不推诿、不奢求；不媚上、不凌下，为官如为人，官德如人品。

追求自由与秩序的丰富内心

公务人员的心理偏于保守，内心渴望以正常秩序为基础的安宁。所以，就社会而言，最优秀的人本不应聚集于公门，更多的人才应如种子般播撒到四方各行，到最深最远的海洋搏浪驰骋，到科技、教育、艺术等社会领域释放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。人人尽展其才，各安其位，老有所依、幼有所养、壮有所用，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，就是公务人员追求的秩序。浮士德所谓“我愿看到人群熙来攘往，自由的人

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”和“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和自由，然后才配有自由和生活的享受”，都是浸透了辩证法的智慧。

越是经历过苦难动荡的国家，越是珍惜秩序的可贵，越害怕失序的状态重演。中国自古家国同构，治国如治家。公务不等于无情，内心不能缺少柔软，看到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”的场景，人性自然就会产生安定的幸福感，“存，吾顺世；没，吾宁也”，桃花源和忘忧谷，不在天涯而在身边，只有真诚地爱家，才能诚实劳动、努力工作，热爱脚下这片叫作中国的土地。就内心而言，秩序则体现为自律以及由此带来的平静。古人讲君子有三畏，畏天、畏地、畏大人之言，讲的就是敬重道德、敬重内心、敬重历史的信念。秩序感的背后，是中国政治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、物我合一的民族心性结构，“公”所涵盖的意涵无尽、潜力无限，由个体而家国，由现实而超越，成为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。



《广陵散》随着嵇康的离世而绝响。嵇康已随广陵散曲尽人终，但尚有余音绕梁，这余音便是嵇康的儿子嵇绍。

嵇康死时，嵇绍方才十岁。嵇康虽与山涛绝交，但知山涛之为人，托孤山涛，山涛不负老朋友的托付，照顾并推荐提携嵇绍。嵇绍在当时就立下英名，入《晋书·义烈传》，有其父之风，生活命运又不同于父亲，他也算是广陵散余音的变调吧。

受父亲嵇康的牵连，嵇绍的成长期“靖居私门”，没有交往清流谈玄论道的机会，记载里也没有他食五服散、修神仙、结交隐士的经历。山涛按照自己的思路引荐了他，向武帝推荐为仕，不敢要求过高，只期望他能做个郎官，没想到晋武帝说：他既然这么有才能，哪能做郎官呢？应为丞吧。于是一起步便做了秘书丞。

嵇绍的风度气质有嵇康的影子，刚进洛阳城就有人告诉王戎，说嵇绍“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”。王戎说，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，言外之意是嵇康鹤立鸡群之风度更突出。嵇绍做官很勤勉认真，一步步升任至汝南太守。其识人之明，有据可查。有位丞相曾赞赏地说，假若让嵇绍当吏部尚书，可使天下无遗才。

嵇绍在朝为官时，正逢“八王之乱”，乱事之秋，保身且难，嵇绍官却越做越大，虽有几次小挫折，但很快又复职甚至升迁。他为官认真，且有原则、有人格。比如，贾谧当权时，连潘岳这样的人都攀附贾谧，嵇绍也被拉拢，他却辞而不应，待贾谧败亡，潘岳等人皆被株连，嵇绍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齐王司马冏辅政，城头变幻大王旗，这期间他不投靠任何人，还有几次言之有理的直谏记录。特别是在齐门同府议事时，有人说他琴弹得好，就数次劝他献艺，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弹，说身为官人，不能在高堂上做此举，如身无官，倒可当伶人，这显出了类似嵇康的风骨。兵乱官陷之时，谁都无暇自顾，他只好独自逃命，差一点被埋伏好的乱兵射死。这一次又是嵇康遗传的风度救了他，有将士见他“姿容长者，短非凡人”，于是作罢。

河间王和成都王进京讨长沙王之时，在众人推举下，他又任前军都督，六军之士推举的理由是“嵇侍中勠力前驱，死犹生也”，就是看中了他不怕死的性格。不久长沙王兵败，嵇绍被刳取为“庶人”。但时间不长，晋惠帝亲征，又征召了嵇绍，于是嵇绍直接跑到皇帝的行在之处临危受命，正赶上王师败绩，将官四散而逃，嵇绍却像飞蛾一样向火里扑，“唯绍俨然端冕，以身捍卫，兵交御辇，飞箭雨集，绍遂被害于帝侧，血溅御服”，死得异常悲壮。连麻木呆痴的晋惠帝都深为感动，战后，服侍的人要洗他被血溅满的衣服，他说这是嵇侍中的血，不让人洗。

广陵散曲尽有余音

□ 谢德新

从嵇绍历任文官的经历看，他不是武将人选，却当过前鋒都督，危难时刻又充当御前侍卫，想来晋时用将也够大胆。这位书生义士是有些迂直的，这又有其父之风。行前，同僚问他有无快马，他却正色反诘：大驾亲征，以正伐逆，从道理上说必有征无战；即使真的皇帝保不住，我也要杀身成仁，要快马干什么呢？

父亲嵇康头斩刑场，儿子嵇绍血染沙场，都是视死如归。一个死在强权下，一个死在强敌下，都充斥着浩然正气。嵇康死前，一曲广陵散，余音不绝；嵇绍死时，血映残阳，同为千古绝唱。（本系列结束）



□ 陈家兴

三国时期的魏国，是三国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，却也完美地上演了“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”的历史周期律，存世不过45年。也就是说，生于东汉末年的很多人，是亲眼见证了曹魏政权兴败的。奸雄如曹操者，倘若泉下有知，看到自己一生征战奠定的基业，如此疏忽地败在子孙手里，岂不气得牙痒痒？

公元220年10月，汉献帝刘协把帝位禅让给了曹丕。到了265年12月，这一幕再次上演，魏元帝曹奂也把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。所谓禅让，当然都不是自愿，而是被逼的。历史仿佛一个无情的刻板模子，倘若当政者不能顺天应命，政权你如何得的，它也能让你如何失去，甚至分毫不差。一个强大的政权，何以就如此迅速地覆灭了？这是让人兴叹之余，更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曹魏政权虽然存世45年，但有实质性意义的存在，不过曹丕、曹睿两代，在位时间加起来也就将近20年。到了曹芳即位，司马懿专权开始，其后的曹髦、曹奂，都不过是象征意义的存在。

有话说得好：“你必须不断奔跑，才能够停留在原地。”再强大的政权，即便守成也是守不住的，又哪里经得起胡来？

胸无大志 私欲膨胀

曹操名义上虽是人臣，却是魏国的开山鼻祖。曹丕既是第一任魏君，同时也是守成者。对于东汉末年的流弊，曹丕都是亲历见证者，作为开国

者和守成者的他，却没能汲取教训，深自约束。曹丕缺少的正是历史上不少开国者所具备的胸襟格局，不过一庸碌守成之主，由此便注定了曹魏政权的短命。事实上，在曹丕接任魏王后到尚未称帝前，干的几件事，就让时人立马判断出曹丕的庸碌征象。

当时，正在选拔侍中、常侍之类的官员，曹丕就准备用身边常给他出谋划策的那些人，而不从别处选。这表明，曹丕目光短浅，胸无大志，一上台就想先把身边人用起来，这岂是定国安邦之策、长治久安之谋？

这时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及时劝止。据《晋书》载，司马孚说：“虽有尧舜，必有稷契。今嗣君新立，当进用海内英贤，犹思不得，如何欲国际会自相荐举耶！官失其任（不靠才能靠关系），得者亦不足贵。”这一席话，才打消了曹丕的念头。

而在接受汉献帝刘协禅让的时候，曹丕就公开把刘协献上的两个女儿纳为妃子，这在古代被认为有违礼制。事实上，曹丕这种只顾贪色而不顾及其余的特点早就显露了。当初在曹操攻破邺城时，曹丕见到袁绍二儿子袁熙的老婆甄氏长得好看，就娶她为妻。后来甄氏生下了曹睿，曹丕即位后，又宠爱了贵嫔郭氏，而把甄氏留在邺城。结果郭氏乘机进谗言，说

甄氏有怨言，曹丕竟然大怒，派出使者命令甄夫人自尽。

后来的东晋史家、名士孙盛从曹丕的行迹分析说：“及至受禅，显纳二女……是以知王龄之不遇，卜世之期促也。”事实上，在曹丕登基为魏文帝之后，其所作所为，更尽显其纵私欲而又无能短视之相。

有一天，曹丕居然对待中苏则说：“以前攻破酒泉、张掖的时候，西域曾经派使者到敦煌来，贡献直径达一寸的大珍珠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来做生意，我们也好一点呢？”还好不是为了这点私欲而发动战争去抢。但一当政就物欲膨胀，连这点事都惦记上了，又岂是干大事的料？苏则却回答得毫不留情面：“若陛下化洽（以教化润泽）中国，德流沙漠（威德远及沙漠），即不求自至。求而得之，不足贵也。”曹丕的反应则是“嘿然”，显然不好反驳但也内心不快。这一事，足见曹丕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，对臣子问的是如何满足物质之欲，而不是问苍生问治国大计。这和汉文帝召还贾谊于宣室，却是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性质差不多。

器量狭小 公报私仇

曹丕心胸狭窄，器量狭小，在历

代君主中可谓无人能出其右。历史记载，曹丕器量狭小的事主要有三件。一件就是在221年羞辱于禁致死。原来在219年时，曹操的良将于禁兵败后投降关羽，关羽败亡后，于禁又从荆州被获释到了吴国，到了221年孙权便遣还了他。此时的于禁须发皓白，形容憔悴，见了曹丕又是哭又是叩头。

曹丕一面用荀林父、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他，还任命他为安远将军，要他去拜谒曹操的陵墓；一面又事先派人在陵园屋子里画上关羽得胜、庞德愤怒、于禁投降情状的壁画。结果于禁见到这些画，羞愧患病而亡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评价说，“文帝废之可也，杀之可也，乃画陵屋以辱之，斯为不君矣！”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，曹丕所作所为也太不像个君王了。用大众的视角看，曹丕的做法阴狠如同小人。如此行事，只会寒士人之心。

纵情使性 刚愎自用

222年，曹丕决定派大军讨伐东吴。这次大讨伐，既不是什么战略图谋又不是什么战术行动，完全是在纵情使性、刚愎自用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。当初，孙权派于禁的两个手下浩

周和东里衮来见曹丕，言语之间相当低调谦恭。曹丕就问：孙权可信么？浩周说孙权一定会臣服，东里衮则说不一定。结果曹丕居然只喜欢听浩周的话，这就有点把臆想当事实来判断了。

曹丕这一喜欢听不要紧，居然还派浩周回去，封孙权为吴王，并让孙权派儿子来做人质。孙权表面感动得泪汪汪的，结果没有任何实质行动，往来之间全是虚话，气得曹丕还决定讨伐，谁劝都不听。可以说，这次征战，完全是一次维护面子的行动，为了面子而贸然行动，往往会丢更大的面子。曹丕如此行事，仿佛战国时期的楚怀王再世。楚怀王先被张仪欺以割让“商于之地六百里”而与齐断交，恼羞成怒之下，便举全国之兵攻秦，三战皆败，后被秦昭襄王欺以武关会面而扣留，最终客死他乡。这类人为政，自己愚蠢害人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因此而误国害民，害莫大焉。

从此，曹丕就与伐吴这件事杠上了。曹丕这年9月起兵，11月还亲自南征，到了223年3月便无功而返。224年7月，曹丕到许昌巡视，又想大举进攻东吴，辛毗怎么劝都不听。表面上他是不想把孙权这个后患留给自己，骨子里恐怕还是自己的面子在

作祟，结果又是无功而返。到了225年，曹丕又想率水军再次伐吴，召集群臣讨论。鲍勋历数征讨失利的原由，直言这次又劳兵袭远，白耗钱财，而敌人依然气焰嚣张。曹丕大为震怒，一气之下把鲍勋降职。这一次征讨，曹丕还差点被东吴人偷袭丧命。

到了226年正月，曹丕才醒悟过来说：“自今讨贼计画，善思论之。”曹丕在位实际也就不到6年时间，却用4年时间反复干一件劳而无功的事，不能不说，这醒悟来得太晚了。因为到了这年5月，他就呜呼哀哉了。难道是人将死，其思方善乎？

晋史家陈寿对曹丕盖棺定论，却玩起了春秋笔法，批评的意思正面讲。在充分肯定曹丕文才后，便对曹丕提出了假设如何如何，就会离古代的贤明君主不远云云。“若加之旷大之度，励以公平之诚，迈志存道，克广德心，则古之贤主，何远之有哉！”其中四句假设的话，反过来说就是气度不行，无一颗公心，不能捍卫道义，缺少贤德之心。这样的庸主，又怎么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兴旺发达？

总的来看，曹丕没干过善治长安的大事，为政庸常，又常率性行事，使其基业空虚萎缩。幸得有乃父曹操留下的基业与贤臣，使其能勉强维持，还不至于几年就消耗一空。

